

小规模家庭的分化与聚合

——对挑工家庭的田野调查报告

张远晶

(广西民族大学, 广西 南宁 530006)

【摘要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会在城乡流动中加速分解。笔者希望将家庭结构的变迁放入人口流动研究中,探究农村家庭结构在其中是否趋向核心化。因此,笔者于2021年暑期,在广西隆安县那桐镇开展了为期15天的田野工作,对当地概况、产业发展及课题的研究对象——来自云南文山的挑工家庭进行了调查,探究其家庭组织结构的变迁及其如何适应新农业的发展。

【关键词】家庭经济;小规模家庭;实践逻辑

【DOI】10.12294/j.issn.1673-0992.2022.08.048

一、调查方法

本次田野工作,笔者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、访谈法及文献阅读法进行主题调查,通过走访当地政府、农业领头企业负责人及报道人进行访谈,总结出在农业转型的背景下,农村外出务工家庭如何通过联合就业,形成小规模家庭形式,而适应农业经济的变化。

纸质资料主要来源于镇政府和当地龙头农业企业金穗公司,主要访谈对象集中在个案家庭成员以及香蕉产业内其他从业人员,还有个案家庭亲属、朋友等。调查过程中阻碍颇多,给本次田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一是天气阻碍,夏季多雨,天气原因导致多次田野工作无法开展,耽误了田野进度;二是个案家庭工作时间长、强度大,无法安排长时段的时间进行访谈,因此采访地点主要集中在田野对象的工作场域中,只能通过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断断续续的交流,从交流碎片中拼凑他们的观点与生活逻辑;三是部分采访对象不愿进行深入地交流,且词不达意,需要不断地澄清语意。

二、那桐镇概况

那桐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隆安县东南部,是全国重点镇,东与丁当镇接壤,南同南宁市郊坛洛镇毗邻,西与乔建为界,北和小林乡隔江相望,区位优势得天独厚,铁路、公路、航运四通八达;素有“隆安县粮仓”和“水果之乡”的称号,是隆安县的经济、农业和文化旅游重镇,是稻作文化的发祥地。那桐镇略呈长方形,长距19公里,宽距10公里,总面积187平方公里。辖1个街公所、11个村公所和45个村(街)民委员会,总人口5.1万人。自土地流转政策以来,截至2020年底,那桐镇全镇土地流转达12万亩,流转率达到69%以上。全镇种植香蕉、火龙果等水果9.3万亩、蜜本南瓜1.35万亩、糖料蔗2.65万亩,

出栏猪10.69万头、家禽172.82万羽,培育火龙果、香蕉、甘蔗、猪、牛、鸡和糖料蔗等“5+2”特色产业,产业覆盖率达96.99%。2020年全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6.62亿元,同比增长17.11%。那桐镇香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,金穗公司在国内自有十大香蕉生产基地,种植面积达2.1万亩。

三、小规模家庭:一个经济组织和外出单位

“挑工”指以帮助别人挑东西为生的人,又名担夫,史载之“专在市场上,为客人挑货负物及一切行李筐筐,以博微资,所谓苦力者是也”[1]。广西的挑工职业由来已久,候宣杰在对近代广西挑夫的探析中,认为在小农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扩大的背景下,广西的自然地理条件无法满足农业经济的发展,在此情况下,挑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挑工的人力运输得到了兴盛。[2]如今,伴随着那村香蕉产业的规模化经营,挑工职业再次进入到农业发展的图景中。

本文的田野调查对象是挑工尹对文(化名)一家,他们的家庭包括了尹对文的核心家庭,尹对文的大哥尹对武的核心家庭,以及尹对文的大姐尹晓玲的核心家庭,三个核心家庭联结在一起,形成一种联合化的小规模家庭经济组织,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既分化又聚合,实现了家庭的经济适应。

尹家人来自云南省文山县,尹对文生于1996年,今年25岁,是家中最小的儿子,但已有了两个小孩,分别是6岁、7岁。自初中毕业后,尹对文就开始外出打工,一开始是到广东工厂做一名流水线工人,但流水线的生活对于年仅16、7岁的尹对文来说过于枯燥,且当时在工厂上班得到的收入并不能让他满足,“我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得的钱太少了,就不想做了”(尹对文语),因此,辗转之下,由亲戚介绍,尹对文接

触到了香蕉农业，并从2016年起，尹对文开始从事挑工行业。他的妻子吴晓华（化名）此时也开始跟着他一起从家乡出来前往广西、海南、云南等地，在挑工团队里负责挂绳索。2017年，尹对文的哥哥尹对武、姐姐尹晓玲开始跟随尹对文一起从事挑工行业，对于兄弟姐妹共同做挑工，成为一个团队，尹对文是这么解释的：“一开始的时候是我最先做这个，发现得钱比在家里打零工多得多，就把我姐、我哥他们都叫来了”（2021年7月21日访谈内容），基于经济需求与一种理性思维，尹对文认为与在他口中“落后的文山”待着，“不如到处跑，挣钱来得好”（尹对文语），由此，三兄妹的核心家庭称为独立与合作并存、分化与聚合共生的共同体组织。“他叫我们过来我们就过来了，之前在家里种玉米，拿玉米去喂猪的，自己不吃，一年也就卖一头、两头，有时候一头都没有卖的，家里面有三个小孩，做这个做一个月就有一万块钱。”

（尹晓玲语，2021年7月21日访谈内容）。在访谈中尹对文的妻子吴晓华甚至会与笔者开玩笑说：“你不要读大学了，你们那个大学没有我们这个有前途，读大学挣不得多少钱，我们挣一个月就有一万块钱，来跟我们做挑工了，跟着这个队长，赚大钱，我们都是跟着他吃饭，他去哪里我们去哪里，他是老板嘛。”

（吴晓华语，2021年7月21日访谈内容）

从一开始做挑工，到2017年开始，尹对文做起了挑工队长，对外的人都称呼他为尹队长，从挑工到队长，从只能骑摩托车去开工，到后来买了汽车并在老家修建房屋，尹对文完成了从农民工到工头的转变。他的哥哥尹对武和姐姐尹晓玲从2016年至今，一直都在尹对文的挑工团队里，从一开始仅仅是团队的一名成员，到后来可以成为小队长，两人对当下的挑工生活都十分满意。在调查期间，我曾询问尹家人是否有考虑过其他职业，或者承包土地种植香蕉，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。

笔者：你们有想过做承包户吗？

尹对文：没想过。自从我管过三年香蕉，就没想过了，那个一个月至少要20天在地里，又很累，这个至少你想做就做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挺自由的，比那个自由多了。不想做那承包户。

笔者：做挑工很辛苦吧，怎么熬下来呢？

尹对文：对，前两天、一个礼拜都很难受的。唉呀，没钱就熬下了，有钱我肯定一累我就不干了，都是钱逼的嘛。干到现在就不懂累了。现在我们挑来挑去，肩膀这里感觉像死肉一样都不会痛。我们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家人，都是带亲的，顺便把孩子也带来了，要是去工厂就难带孩子，而且这两年工厂怎么做？两

三千块钱一个月怎么做？（2021年7月22日访谈内容）

对于尹对文三兄妹的小规模家庭来说，家庭不止是情感共同体，更是经济组织和外出单位。在尹对文做挑工之后不久，他的妻子吴晓华离开了云南文山，自此，他就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进城务工。尹对文一直以“家本位”的态度来看待做挑工这个行业，正如访谈内容所提到的，一家人一起做挑工，夫妻双方还能够将儿女带在身边，可以带孩子，“这样我们走到哪家就在哪嘛”（2021年7月22日访谈内容）。尹对武的妻子和尹晓玲的丈夫跟随着一起做挑工的原因也不出左右，尹对武说：“我弟做挑工做得蛮好的，叫我们来，挣钱我们就来了，我家那个跟着我一起，一家人一起出来好一点。”（2021年7月22日访谈内容）。

挑工的工作形式以团队为基础，一个团队大约9人左右，因香蕉种植地一般会驾接索道，方便香蕉的较远距离运输，因此，一个挑工团队中一般有2-3名女性负责挂绳索，其余人负责香蕉的“挑”，即人力运输。团队工作讲究的是团体合作和效率，因此，往往需要一位领导者或监督人，尹对文作为队长就扮演着分配任务和监督的角色，而以家人为团队，在监督和激励上省去了很多麻烦，因为“他们都知道是给自己兄弟干活，肯定会卖力啊，而且干得越快越早收工，就可以休息了”（尹对文语，2021年7月24日访谈内容）。尹对文将家里人都招呼到身边从事挑工行业，在一个团队里往往还能够体现劳动力的优势，“我作为队长有时候是可以不用干活的，监督他们就就行了，但如果我哥我姐嫂子姐夫他们需要帮忙，我也会去帮，一家人嘛，也不用计较那么多，还可以让大家都早点休息”（尹对文语，2021年7月24日访谈内容）。劳动力的充分使用是家庭作为经济组织时所展现出的特殊优势。

韦伯认为，随着理性化的进程，企业经营将脱离家庭共同体。^[3]尹对文一家人共同外出务工虽没有以家庭经营的形式进行，但尹对文作为队长实际上是拥有分配工作的权力的，因此，如果按照韦伯的观点来看，尹对文一家的情况却与之相反，家庭与经营的分离没有发生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发生，尹家并没有明确的资金和财务分割，消费支出与盈利最终仍然统一于家庭。

四、各核心家庭之间的互助合作

小规模家庭联合外出，它的结构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并不始终保持稳定，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和外出单位，它是多元的、权变的。从2019年开始，尹对文的哥哥也开始尝试着担任挑工队长，改变了一直跟着他打工的状态，作为挑工队长，也算是有了一份自己的小事业。由此，尹对武不仅仅是尹对文挑工队伍里的一名工人，也是和尹对武地位相当的队长，其家庭

结构也开始分化。

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我做队长赚钱，手里有人，有100多个工人可以给我安排，我随便安排任务，那我有资源当然也可以分给我哥一点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不用担心他比我做得好不好，一家人不用计较那么多，而且我们也可以互相介绍工作，也是好事，这样我哥他们家的压力也可以减小一点。（2021年7月25日尹对文访谈内容）

这样，三兄妹之间其中两个算是都有了各自的事业，并且基本上分开独立做。除了避免因意见分歧而产生冲突外，相互分化也许还可以整合更多的资源。正如尹晓玲的女儿所说：“我舅带我爸妈还有我大舅一起出来，我大舅现在也可以当队长了，这是我舅帮忙的，一家人一直在一个团队是好的，但是即使不是一个团队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，分开还可以多挣些钱。”（2021年7月25日尹晓玲女儿访谈内容）。但核心家庭的各自独立，并不意味着将大家庭中的其他核心家庭孤立起来，核心家庭相互分化的同时也并未产生分裂，依靠血缘和亲情的纽带，他们仍然是一个内部密切联系的有机体，在劳作和生活上依旧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和互助。尹对文说：“其实现在我们家其实主要还是由我来做主，虽然我是最小的，但是我比较会说话，也能干活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安排，我哥我姐他们都不用管，他们很轻松的，压力都在我这边。”（尹对文语，2021年7月26日访谈内容）。从尹对文的话语中可以得知，在经济变化、家庭流动的过程中，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，长者为尊的模式并不一定仍然适用于现在的家庭结构，尹家人的话语权掌握在更有能力的尹对文手中。尹对文的话语也在其外甥女（即尹晓玲女儿）的口中得到证实，尹晓玲的女儿认为“因为我舅他最先开始做这个的，他最有经验，我爸妈比较老实，很多东西不懂都是我舅来处理的，他帮我们家很多，挑香蕉的时候安排任务也不会说自己完全休息，脏的累的都交给我们，所以我们都是尊重他的，也愿意听他安排”（2021年7月26日尹晓玲女儿访谈内容）。

除了劳作方面的互助以外，彼此联结的一家人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相互照料。正如尹晓玲的女儿之所以也会加入到挑工团队中，正是在尹对文的帮助下选择的休学期间的过渡。尹晓玲的女儿2004年出生，今年17岁。2020年初中毕业时，原本打算到职校继续学习，但由于报名时未经过妥善考虑，已注册的学校使其感到不满，便选择了辍学。关于尹晓玲女儿的学业问题，最后出面解决的也是尹

对文，尹对文帮其联系学校退还学籍，并打算为其外甥女报名卫校，希望其以后能成为一名护士。但由于手续迟迟未能妥帖办理，尹晓玲的女儿不得不休学一年，休学期间她选择跟随舅舅以及父母来从事挑工行业挣零花钱。

“我来这里就挂绳子就好了，明年还要去文山的卫校上学，今年来做这个还挺好的，也不累，我来了28天也有1万块钱了。以前爸妈出来做工，偶尔回家还会有一点陌生，现在跟着过来，也体验到他们的不容易了，我爸妈之前也承包过香蕉地，但弟弟上学有压力，回家做农业害怕卖不出去，所以就跟着我舅过来继续做挑工了。我们过来做工我舅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家里的事情就是各管各的。”（2021年7月28日尹晓玲女儿访谈内容）

从尹晓玲女儿的访谈内容得知，即使是联合外出务工，但三个家庭中仍然是有着分工的，工作中的事务都由尹对文负责，但家庭生活并不是完全融合在一起，也有着一定的边界和分化，但始终仍然是一个大家族的模式。

五、结语

家庭在当代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^[4]，对于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挑工们来说，家庭承载着维系情感的作用，同时也是挑工们奋斗的动力来源，更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。小规模家庭以联合化的家庭共同体整体外出，既独立又合作，既分化又聚合。这种家庭经济组织具有明显的动态性、多元性和权变性，很难用流动人口研究中常见的关系网络理论来解释。因此，对于挑工家庭的调查研究，需要从新的视角去看待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侯宣杰. 近代广西挑夫运输探微 [J]. 广西民族研究, 1998(04):98-104.
- [2] (德) 韦伯:《经济与社会》(上卷), 林荣远译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7.
- [3] 黄宗智. 中国的现代家庭: 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 [J]. 开放时代, 2011(05).

基金项目：广西民族大学2019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“小规模家庭集体生产与新型农耕合作研究”（编号：gxun-chxzs2019062）。

作者简介：张远晶（1996—），女，广西柳州人，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，2019级在读硕士，研究方向：民族学。